

技术赋权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

■方俊 蒋艳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当青年政治参与碰上“民主”与“科学”这个世纪难题时,技术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不逊于过往。人工智能技术对青年赋权具有提升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及效能、进而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潜能。当市场与技术合谋时,技术赋权又以极不相称的方式有利于企业发挥其政治影响力,而数据主义将主体降格为数据的潜在风险,也会充分消解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随着技术发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及青年信息素养的提升,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有望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技术赋权 人工智能 青年政治参与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6.004

信息技术与其他社会变革日渐融合,深刻介入青年社会生活,并催生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形态:网络政治。在互联网仍然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公共信息事业的语境下,网络中的青年政治参与充满了张力和不确定性。信息技术对基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乐观主义者曾广泛评估信息技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1],批判理论则认为商业化的社交媒体并不构成公共领域和参与式网络,市场需要主导下的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民主危机的问题^[2]。究其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对国家、社会乃至个体都进行了赋权。如今,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个体的生存样态及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了新的变化^[3]。人工智能席卷一切的巨大效能,促使人们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与人的关系将如何继续发展的的问题,是通过智能化机器来增强人的智能和体能,还是任由智能化机器最终取代人类?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个体和社会如何利用技术支持自身,技术赋权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又如何形塑了技术、市场需求、青年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技术赋权提升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及效能

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和政治过程各类行动,它通常包括制度化参与

收稿日期:2020-08-25

作者简介:方俊,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青年学理论;

蒋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年学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研究项目“青年信息道德责任的建构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18JKDY43)、湘潭大学科学研究项目“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思想研究”(课题编号:KZ03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参与是在现有制度法规框架内采取合理途径参与政治过程,与此相对,不被现行制度法规认可的政治参与方式则是非制度化参与。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青年政治参与不仅受主体参与意愿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为自身参与能力所制约。由于政治参与涉及信息搜集和处理,在影响青年政治参与能力的诸多因素中,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信息技术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应用不仅事关青年的动员和参与问题,而且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信息技术之所以能推动青年政治参与,在于它通过技术赋权提升了青年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作为一个名词,人工智能有两重不同的含义:广义上的人工智能泛指机器智能,狭义上的人工智能指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的研究机器智能的方法^[4]。通常认为,它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出一些计算机程序或者机器,让它们能够做出一些如若被人类实施则会被我们视为智能的行为”^[5]。人工智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间经历了几个高低起伏的阶段。最近一次爆发始于2006年,当时,深度学习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提供的海量数据和计算能力,使得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学习并识别文本、语音、图像等内容。随着智能问题被转化为数据问题,机器和计算机软件开始变得智能化。自此以后,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对象。

由于人工智能是在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算法的背景下产生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质是信息论基础上的数据处理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是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换言之,由于大数据的科学基础是香农的信息论,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取代原有的信息技术。这同样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并不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信息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形态,毋宁说,它是在信息时代已经改观的青年政治参与形态基础上的新变化。因此,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前景,不能回避既有信息技术给青年政治参与带来的改变。

青年与信息技术在生活方式层面的亲缘关系,使得青年政治参与呈现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政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路径和范围,也充分改变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和效能。青年作为最容易使用信息技术的群体,人们常用“技术化生存”来形容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对信息技术的高度依赖关系^[6]。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同青年政治参与结合的结果是,无论是制度化政治参与还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拓展了新的线上参与途径,后者在改变传统线下参与模式的同时,也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参与的方式在参与主体、参与意愿、参与范围、参与效能等方面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样态。这种变化尤其发生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层面,通过探究这些新变化的具体细节,人们得以了解青年在线上采取的行动策略以及线上线下互动的具体方式,了解个体或群体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参与这些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

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充分探讨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在后革命年代私人生活领域的去政治化和娱乐化大背景下,由于青年群体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互联网使用和上网频率降低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可能性^[7]。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发现,由于社交媒体的便捷性和自主性,青年对社交媒体抱持正面态度,从而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有别于互联网的负面作用,它能有效提升青年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效能^[8]。可见,信息技术给青年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复杂多样,尽管网络政治在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它同样有可能通过消耗过多时间和精力而导致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降低,可能由于网络政治带来的效能感缺失而导致青年拒斥线下更真实更重要的政治参与,也可能由于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而导致无序化参与。

网络政治呈现的多维向度意味着,信息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是一个由技术、制度与大众化

等因素共同建构的政治场域^①。在这个政治场域中,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网络政治的框架基础和限制,信息技术不仅充当了网络政治的技术基础,也为参与其中的青年构建了一个充满可选项的广阔空间,使主体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究竟有何影响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但信息技术作为网络政治的先决因素意味着如下事实:网络政治的可能性、发展路径及发展前景完全为技术发展所影响和推动。如果没有信息技术对相关各方进行赋权,网络政治将变得不再可能。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政治的发展历程与互联网业态的发展历程得以同步进行。互联网业态发展先后经历了门户网站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和智能化媒体时代,这三种业态并非革命式的取代和颠覆关系,每一次由技术推动的新业态发展,都会促使原有业态利用新技术改造自身,进而以新的形态出现。必须强调的是,机器或者软件获得智能靠的不是推理,而是大数据。在传统的互联网时代,数据量非常大,但缺乏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和办法。不仅如此,技术视野中的人工智能包含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以运算和存储能力为依托的运算智能,以延伸人类感官的感知技术为依托的感官智能,以让机器能够模仿人类的理解和思考的认知智能。媒体行业目前接触的只是运算智能及感知智能的一部分,至于更高级的认知智能,由于技术等原因还没能提上议事日程^[9]。即便如此,运算智能和感知智能技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传统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技术水平,从而增强了技术对青年的赋权能力。

在传统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不考虑政府规制和数字鸿沟的影响,即使人们可以在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时候做到开放、共享,也很难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中识别出那些持有相同价值和立场的共同体,从而极大地限制了青年政治参与的规模、动员能力和持续时间。在门户网站时代,青年通过网络集聚力量并表达政治诉求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引发青年关注的话题本身通常是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无论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还是近些年来的“帝吧出征”都属于这一类型。在社交媒体时代,通过网络集聚力量是形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青年建立起各种联系,在这里,主体的个人意志及其是否采取实际行动仍然是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限制了青年进一步集聚力量的可能性。这两种类型都存在缺点,门户网站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中心—发散”结构给许多所谓的“专家”和“大V”支配舆论提供了充分便利,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微信、QQ等社交媒体特殊的交友属性,使得其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很容易由于能量耗散过快而归于沉寂。

如果传统父权下较为弱势的青年能够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上局限都能够被克服。无论是通过互联网还是社交媒体参与政治,参与者的主观意图及真实态度都难辨真伪,当政治参与局限于线上参与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人们在无压力时能更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利用运算智能和感知智能,社交媒体不仅能够察觉用户的真实意图,还能够知晓用户处于何种具体的实践场域,受何种因素的限制和制约,有哪些利益诉求。同传统互联网的信息共享相比,青年可以通过数据生产及其相关性寻找潜在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将利益、价值观、需要相近的个体关联起来,从而产生赋权机制。如此一来,无论是通过集聚力量表达共同利益诉求来追求青年自身的权利,抑或是通过汇集民意促使政府做出相关改变,都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通过搜集并识别处理各方面的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青年权利保障机制。

一直以来,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都被视为阻碍民主制度运行的重要原因,当代民主理论的重要人物罗伯特·达尔据此认为,信息技术能够为矫正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技术手段^[10]。在人工智能技术到来之前,这种观点不够准确。信息和知识的确能够让政治过程和权力“解神秘化”,

^① 参见胡献忠《网络政治的生成与青年政治意愿表达》,载第六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网络时代的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报告》2010年。

从而使政府决策更透明公正。但是,信息和知识并不会自动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本质上,尽管信息共享是信息识别的前提,但二者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人工智能技术之前的信息技术使信息共享成为可能,但如何识别、处理信息中隐藏的知识和真相有赖于主体的思维能力,同时它在较大程度上受信息鸿沟和技术霸权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将智能问题化为数据问题,并从大数据中学习获得信息和知识。如果青年能够提升信息素养,充分利用技术赋权,将有助于青年增强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也能通过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造就一个对政治事务更有参与能力的公民群体,从而为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培养一个稳定的民众基础。郑永年也发现,即便有“数字鸿沟”的影响,技术赋权也能够通过产生分权的效果而促进政治民主化^[11]。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提升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与效能。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帮助青年更容易知晓事物真相,当某个事物的因果关系无法确立的时候,人工智能对数据的分析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数据中包含的信息可以帮助消除不确定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代原先的因果关系,帮助得到问题的答案^[12]。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空间中不断出现的热点问题被各种“反转”的情节让那些关心热点的人屡屡受挫,认为真相难寻。得益于大数据技术,如今人们更容易接近真相,也提高了网络空间中的互动意愿。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不仅能帮助找寻潜在的共同体成员,从而通过精准动员而扩大参与的规模;也可以将相关信息和数据分发和推送给特定的个体,进而通过持续动员防止青年政治参与的能量耗散过快;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感知监督政府和政治过程,使政府和政治过程更加透明可见。

鉴于信息的生产、编辑和分发对于青年认知及行动的显著影响,这种提升在国家将价值规范融入到技术设计过程的时候体现得尤其明显。众所周知,技术进步并不等同于社会进步,某种技术进步之所以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体现,是由技术本身的性质、技术设计和运作过程中包含的价值决定的。智能化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找人”的时代,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作为青年的第一信息源,如何让真相等正确的信息去“寻找”青年,既离不开价值规范的引导,也不能缺少技术的赋能。正如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主流媒体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3]

二、市场与技术合谋、群体性孤独与政治冷漠

青年群体与新技术的亲缘关系使他们更容易利用新技术来支持自己,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青年在利用新技术支持自己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包括技术上、学术上、政治上的,但更多是商业上的成就。总体而言,作为一个年龄群体,青年更多受新技术及相关社会变革所共同造就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处境并非单纯由其年龄因素造成,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技术赋权不仅发生在青年身上,也同样改变了国家和社会。在如今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中,考虑技术变革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不能忽视由市场需求推动的技术发展逻辑和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国内而言,政府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处于设计者的地位。因此,早期技术赋权对国家的影响明显大于企业,这使得由市场需求推动的企业较难延伸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和企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2017年国务院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市场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则发挥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功能。相比早期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兴起的时代背景更有利于企业发挥其政治影响力。这种变化连同技术对主体人格的消解,共同描绘了一幅青年政治参与的不容乐观图景。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还必须从市场和技术的视角去加以理解。

像任何一种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会产生新的技术权力和政治权力。从资本逻辑和技术发展本身来看,人工智能技术都无法避免这一点。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起源和发展是资本逻辑充分运作的结果,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发展的方向和具体路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对信息论的依赖性意味着,只要控制论的幽灵一直存在,人工智能用技术取代人类的发展路径本身就蕴藏着技术统治的风险。实际上,人工智能领域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一派主张用智能化机器取代人类,另一派基于人机交互的理念主张让智能化机器为人类服务^[14]。在前者那里,智能化技术增强人的行动能力和智慧只是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机器实现或超越人的智能。正因如此,人们才担心被智能化机器排挤出整个劳动过程,甚至最终会被机器统治和奴役。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如今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巨头控制着海量的数据资源,在没有法律规制的情况下,理论上讲,他们能够通过后台干预摆脱公共权力的监督和控制,从而获得传统企业所无法获得的公共权力。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人不会被智能化机器所控制,但是人却会被智能机器的控制者、受控制者意图影响的研发人员所制造的智能机器等因素所影响和控制。这种场景绝非科幻想象,而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够将商业传播机制中最重要的信息服务、受众调查和注意力售卖进行无缝衔接,这一技术突破在商业媒体运营中极大压缩了主体的自主性,其后台化的操作模式使得公共力量对传播的监督难度大增,并使得垄断传播资源的社会舆论权力得以大幅扩张^[15]。

算法推送的后台操作模式还意味着,在整个大众传播过程中,普通人并不知晓算法的运作机制,也无从打探这些社交媒体与外部的利益关系。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的依赖,使得数据生产和使用成为这个时代权力和财富生产及分配的重要机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刺激下,信息鸿沟转换成数据鸿沟及数据霸权,它意味着网络政治在新的智能化场景中继续以极不相称的方式有利于企业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对那些掌握了智能化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技术的企业而言,技术增强了他们影响他人思想和观点的可能性。由于能够搜集用户信息,又由于人们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能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较之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智能化场景中的社交媒体更清楚受众的真实想法。他们基于特定的算法选择特定个体,并将这些信息持续不断地推送给他们。因此,当个体不断看到相关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现了符合自身行为期望的“正面信息”。由于这种效果类似于心理学上的自证预言,它会持续加强个体关于自己行为是正确的这样一种信念。在这种情境下,算法推送远非给个体推送某些信息这么简单,它是在给个体提供建议,最终通过持续不断的建议影响个体的决策。当青年不是基于主观认知,而是依据智能化机器给出的建议而采取行动的时候,智能化机器就不是增强了青年的能力,而是取代或者说控制了青年的主观意愿。

在技术乐观主义者那里,信息技术能够通过机器让信息自由流动以瓦解资本的特权垄断。因此,人们将信息技术对青年进行赋权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推手。但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青年政治参与同生活中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都面临着信息超载或者数据超载的问题,面对这么多矛盾的数据,很多年轻人干脆拒绝参与政治过程^[16]。如此一来,从信息共享到获取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识别有用信息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中间环节,恰恰成为妨碍青年通过互联网构建一个信息乌托邦的拦路虎。

对那些期待“技术倒逼政治民主化”的人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将主体降格为数据的做法也不是一件好事。人工智能技术用数据问题来处理智能问题的思路,实际上也将人视为数据库。从技术的视角看这种做法无法避免。问题在于,一旦作为主体的人被降格为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际上消解了人的独特价值。过去,人的肉体作为真实存在而被感知,他的自主性以及立于其上的民主、

自由、人权都得到普遍认可。一旦人被视为各种数据的集合,那些象征着人的自主性的所有属性实际上都被智能化机器消解了。如果说主体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再生产自身的话,那么智能化机器用数据在虚拟世界中重新建构了“人”。算法推送制造的假象具有取代事物的本来面貌成为“真相”这一潜能已经表明,这个被建构的“人”不再具有隐私,不再具有自主性。相比由早期计算机技术建构的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更容易被资本的数据霸权所消解。

不仅如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青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样态也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参与意愿,这自然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如果说智能化机器在现实世界中对青年的智能化增强仍然有限的话,那么它们在社交互动方面已经成为青年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就已经通过计算机进入虚拟世界,他们在虚拟世界中过着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生活。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被引入到互联网中,人们利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来训练神经网络,基于计算机视觉与语音识别的智能化软件和机器已经成为年轻人生活的朋友。诸如 Siri、天猫精灵、小度等智能化软件和机器正在成为年轻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改变了智能化机器与人类的关系,进而对人际关系产生了更多的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在研究年轻人(主要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与智能化机器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习惯时发现,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体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他们求助于科技,以便找寻一种既可以获得人际关系,又能够保护自己的方法^[17]。在人通过智能化机器与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弱化,有些人甚至丧失了人际交往的能力。表面看来,个体通过智能化机器与他在交流,实际上这种人际关系是一个很容易消失的“气泡”。比起他人,个体实际上更依赖智能化机器,这种看似紧密的人际关系互动实际上揭示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个体生存的“群体性孤独”特点。

人类在这种更依赖技术而非彼此的环境中还能走得越来越远。人不仅同机器人一起生活、交流情感,甚至同机器人恋爱并结婚。如果可能,很多人也希望把意识上传到机器中以实现自己的永生。通过将“灵魂”放入机器中,灵魂与肉体可以分开。当主体主动抛弃作为人格独立性依托的肉身时,被人工智能技术彻底物化的人类,也就作为数据被彻底地非人化了。当一切都化为数据建构和数据处理问题时,政治参与本身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年轻人更依赖技术而非线下互动的现象会削弱其政治参与意愿。一方面,在人同智能化机器互动过程中,无需在线下的真实世界采取行动,主体的社交需求也能够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更依赖技术的主体对社会参与的兴趣日减,政治冷漠也伴随着这种趋势不断扩散。虽然适度的政治冷漠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但过度的政治冷漠却显然有悖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初衷。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对个体和社会进行赋权,它既有给青年赋权以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潜能,又能够使青年沉溺于虚拟世界而陷入“群体性孤独”,或者消解其对现实政治的兴趣和能力。

三、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国家战略

尽管技术与青年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上述复杂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并不因此是一种中性因素,更不意味着它在青年政治参与过程中是一种纯粹的外在事实。正是由于它兼具民主政治的解决之道与民主危机的潜在危险,才亟须受到公共干预的制约。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介入社会各个领域,不提及技术进步,就无法讨论进步本身。因此,即使技术运行的政治制度环境比技术本身更能影响政治民主化,但进步本身有赖于整个技术体系的变迁也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把技术进步视为民主政治的外在条件,那就忽视了民主诉求在变革技术基础本身时发挥的作用^[18]。就人工智能技术与青年政治参与而言,规避技术对人的

主体性之消解以及市场与技术合谋所形成的优势,需要抛开技术统治的悲观论调,对包括制度在内的整个技术体系施加干预。正在推进的国家战略表明,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已经将民主政治嵌入到整个技术体系中,或者说,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了技术发展的社会现实。

这种制度设计之所以是可能的,首先在于人工智能技术也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有效地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曾向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致贺信。他在贺信中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人工智能技术在给青年赋权的同时,也给国家赋权。因此,不仅青年能够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参与效能,国家也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好处。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能够快速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进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能帮助国家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尤其是在对国家治理具有关键作用的信息问题上,它能有效地破解信息孤岛难题。政治参与过程是公民与政府的互动过程,意愿表达、政策反馈实际上是一个信息流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打通信息壁垒,更好地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20]。得益于大数据,政府可以在全方位了解、精确评析公众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政策,这样有助于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在相关政策议题上达成更广泛的共识,使决策更加科学化。

如前所述,尽管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国家战略,国家也通过提供各种资源扶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导因素还是市场,其中技术自身的发展逻辑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赋权能帮助企业获取公共权力的能力表明,国家、社会与技术三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这意味着在探讨国家利用技术来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市场和技术权力的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时代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就是国家对社会和个体进行赋权,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能力相对削弱了。这也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不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尽管它是最重要的那股力量。在市场力量和技术权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国家必须通过与社会互动来加强自己的治理能力。

政府、企业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为国家与社会互相靠近对方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它使得国家和社会必须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以提升自己的权力^[21]。一方面,国家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技术权力属于不同的权力类型,虽然国家也会培养自己的技术权力,但资本主导的技术权力仍然有很多国家权力不具备的特征,国家权力需要技术权力的支持和帮助。此外,技术对社会进行赋权使得社会能够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制约国家。在早期互联网时代,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就已经迫使国家在相应政策实践方面做出了巨大改变。在人工智能时代,被更先进的技术赋权的民众在这一方面只会具有更大的能量。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环境对技术运行的重要影响也要求技术权力同国家权力主动合作。

在资本逻辑推动下,由市场需求驱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及市场本身对有效控制市场要素的追求,在网络青年政治参与中产生了诸多乱象。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给企业赋权和个体赋权的能力并不一致,因此,信息共享的民主理念很容易被企业实施的媒介控制所瓦解。如果没有资本宰治下的媒介控制,技术赋权的实质差异不仅难以消除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反而会通过放大差异而阻碍不同社会群体达成共识。又例如,这种对话可能会被诸如意见领袖等少数派控制,也可能由于意见难以一致而陷于无序化的无意义争吵。如何避免人工智能技术的负面影响,并充分释放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议题。普遍认为,在国家层面或者国际层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的监管机制是必要的。

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对青年发展产生的影响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这种治理对青年发展和社会参与具有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就业、数据隐私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改变了青年生活的具体样态。尤其是算法歧视,正在青年内部造成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从而威胁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这种视角下,政府规制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引领作用应重新被认识。卢家银在探讨政府制定的网络规制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时发现,网络规制虽未能有效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却削弱了青年线下政治参与^[22]。这种削弱并不是阻碍了青年线下政治参与,而是防止青年政治参与超出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其最终目的是使青年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不仅如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2月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在我国8.17亿网民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仅占全部网民的18.6%^[23]。从目前网民总体较低的信息素养来看,这种网络规制是完全有必要的。

政治生活与技术发展的内在张力,要求国家采取行动,防止资本逻辑下市场需求及技术统治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这种改变的动力来自内部,涌现于社会治理体系自身之中。在新形势下,国家与社会合作更好地治理国家不仅是技术发展的要求,更是党和政府不断完善民主政治的主观意愿,是由国家主导下的民主和善治。民主与善治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民主是善治的最佳方式,善治能够推动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由于善治的本质特征及关键之处是国家与社会合作,即由政府与公民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因此,吸纳包括青年在内的全体公民参与政治事务,为政治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党和政府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努力的方向。需要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党作为主要推手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政治引领作用。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包括网络政治在内的政治参与新形式才能够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政治制度环境对技术运行的重要性意味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充分激发其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潜能。

从技术自身的角度看,来自公共权力的监督和指导也是完全必要的。人工智能的本源是控制论思想,控制论思想中有两个很根本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负反馈机制,它强调系统的自稳定性^[24]。这种思想应用到人际关系或人机互动关系中,就是要反对单向度的控制关系。诺伯特·维纳很早就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双重可能性,他认为将决策权给予无法进行抽象思维的系统是存在危险的;同样的,将决策权交给只考虑利益的资本也是危险的。

仅就这一点而言,乔迪·迪恩在《通信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互联网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得出了一样的结论,在她看来,技术乐观主义关于“技术倒逼政治改革”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赞美。迪恩认为,幻想与事实、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区别,对于真理和抵抗的可能性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一切都消失在“不真实”的网络空间中。不仅如此,网络空间中用户对他们发出的大量信息并不抱持特定期望,他们表达了很多严肃的内容,却鲜有他人的关注与回应。因此,网络中的参与无法形成一种抗衡资本与技术合谋形成的革命性力量^[25]。在没有公共干预的情况下,技术赋权非但不能增强青年抗衡同样被技术赋权的企业,反而会由于后者的“实质吸纳”被再生产为其依附力量,从而丧失对后者的批判能力和意愿。

关于公共干预对机器技术及其社会应用的重要性,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一句名言,“珍妮纺纱机是用于纺棉的机器,它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成为资本”^[26]。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技术使用的公共干预能够改变技术发展的意义,并产生一系列不同的导向其未来演变的功能。在特定条件下,人工智能作为模仿人类处理和传输数据的机器能够成为民主的推手。

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成为一种国家战略。《规划》对青年文化环境的关注表明,这种引导在强调以技术赋权来提升青年参与的意

愿及效能的同时,也注重规避技术对人的主体性之消解以及资本与技术合谋所导致的媒介控制。如此一来,青年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依法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不断促进政治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不仅如此,通过将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人工智能技术被提前嵌入到整个制度设计中。例如,为了防止青年陷入“群体性孤独”的境地,《规划》强调引导高校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为了提升青少年适应智能环境的能力,提高教育治理能力,教育部在2018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也提到,要高度重视青少年信息素养的全面提升。诸如有序参与、走下网络、信息素养等概念表明,这种干预何以会是技术上成功的、进步的 and 民主的,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何以能够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结语:从百年前的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民主、科学与青年政治参与三者之间就建立起复杂的关系。时过境迁,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科学实现民主的愿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也发生了改变。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再次表明,技术发展能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技术赋权的这种特性意味着,青年、社会和国家都受益于技术的发展。尽管如此,对青年政治参与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具有单一的主导性社会影响的因素。因此,从技术决定论出发的各种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批判都没有考虑技术使用主体的意向性,唯有对技术保持一种开放心态才能憧憬政治参与的未来场景。展望未来,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及青年信息素养的提升,青年政治参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在新的技术发展阶段回答“民主与科学”这个世纪难题。

[参 考 文 献]

- [1][10][11][21]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9、15、17页。
- [2]Christian Fuchs,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Social Media, in Critiqu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 Christian Fuchs and M. Sandoval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60-61.
- [3]肖峰《人工智能时代工作含义的哲学探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 [4][12]吴军《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85页。
- [5]杰瑞·卡普兰《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人工智能》,汪婕舒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 [6]肖峰《技术哲学视野中的青年及其认知特征》,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9期。
- [7]曾鸣《互联网使用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 [8][22]卢佳银《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及网络规制的调节作用》,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8期。
- [9]胡正荣《智能化:未来媒体的发展方向》,载《现代传播》2017年第6期。
- [13]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载《人民日报》2019年1月26日。
- [14]约翰·马尔科夫《与机器人共舞》,郭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 [15][24]吕新雨 赵月枝等《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载《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 [16]卢克·多梅尔《人工智能》,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18页。
- [17]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 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 [18]David Ingram, Habermas: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63.
- [19]习近平《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 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
- [20]《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 [2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2月。
- [25]Jodi Dean,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5 (1).
-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